

大资管时代券商财富管理转型提速 “产品、人才、金融科技”一个都不能少

■本报记者 周尚任

当前,证券行业服务居民财富管理的能力进一步提升,财富管理转型初见成效。

5月22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中证协”)第七次会员大会上的讲话中4次提及“财富管理”,强化了券商关于财富管理功能定位。

对此,多位券商分析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强化证券公司财富管理的功能定位,是证券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深化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的重要抓手。未来几年券商财富管理业务有望加速转型,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券商在财富管理中有特殊地位

5月22日,易会满在中证协第七次会员大会上表示:“聚焦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丰富投资产品,改善账户服务体验。”“证券行业进一步发挥财富管理作用,助力增强广大投资者的获得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国内证券公司财富管理业务大多脱胎于证券经纪业务,目前主要是基于资本市场,为客户提供交易、资产配置、信息咨询、销售金融产品等服务。在大资管时代与各大机构的财富管理竞争能力竞争中,证券公司凸显出独有的优势。”山西证券非银金融分析师刘丽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我国居民财富持续增长,居民对于优化资产配置,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需求快速提升。而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迫切需要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证券行业身处资本市场,在财富管理中有特殊的地位,应该为居民提供更高效率的交易服务、更丰富的金融产品,助力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国内财富管理同质化倾向较明显,与国外财富管理提供的

差异化、定制化、专业化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强化证券公司财富管理的功能定位,是证券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深化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的重要抓手。”刘丽进一步表示。

财富管理转型成效初显

当前,居民财富积累和配置结构改变,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空间巨大。为此,证券行业加快财富管理业务转型,服务市场投资理财需求。2020年,证券行业实现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含交易单元席位租赁)1161.1亿元,同比增长47.42%;实现代理销售金融产品净收入134.38亿元,同比增长148.76%;实现投资咨询业务净收入48.03亿元,同比增长26.93%;实现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299.6亿元,同比增长8.88%,这表明证券行业服务居民财富管理的能力进一步提升,财富管理转型初见成效。

5月13日,中基协首次发布销售机构公募基金销售保有规模百强榜单,该榜单被业内称为财富管理未来发展核心指标。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100家代销机构中,券商占据了47家,“股票+混合公募基金保有规模”合计为8750亿元,占比16.12%;“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保有规模”合计为9650亿元,占比14.81%。从各渠道公募基金销售保有规模占比来看,2015年至2017年,券商的占比从10.01%降至6.05%,但从2017年至2019年,占比逐步回升至7.59%。

2020年,广发证券加快财富管理转型步伐,提升代销金融产品能力,丰富代销产品种类,客户结构得以优化,代销金融产品保有规模同比增长47.5%,实现净利润超百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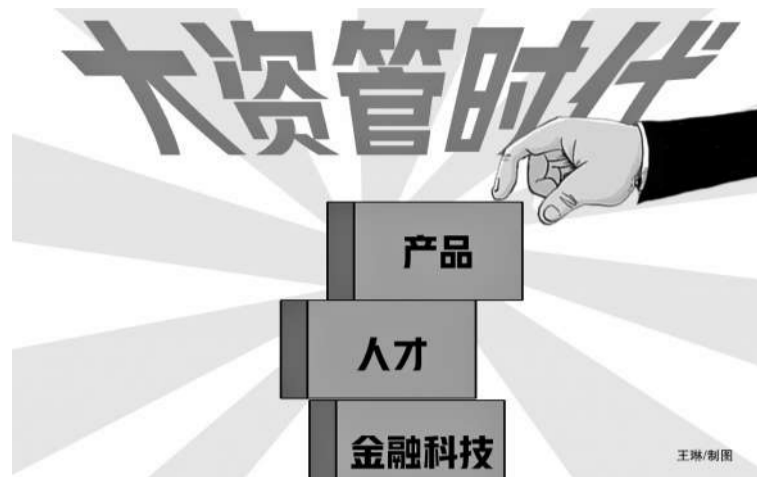
粤开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行业组负责人陈梦浩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居民财富管理、权益市场火热背景下,2020年公募基金为券商提供了一定的

业绩增量,助力财富管理业务转型。当前股票型、混合型基金规模不断扩张,券商对证券市场具备成熟的认识和完善的体系,在相关产品的销售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凭借自身在渠道、服务、权益资产研究等方面的优势,给客户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资产配置方案,在竞争激烈的基金销售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当前居民投资意识增强,理财需求显著提升,在大资管背景下,公募基金市场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券商可以通过业务协同为客户提供优质的财富管理,加速财富管理条线的转型速度。”

从券商2021年财富管理业务的布局情况来看,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国泰君安财富管理业务以理顺金融产品机制为抓手,完善投顾队伍建设,全面加快转型步伐,并保持代理买卖净收入的领先地位。中信证券深化财富管理转型发展,提升资产配置服务能力,推动财富客户及其资产规模稳定增长,优化业务收入结构,进一步提升财富管理收入占比,扩大财富管理品牌影响力。

总体来看,我国券商财富管理转型仍处在起步阶段。陈梦浩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与成熟资本市场相比,当前我国财富管理领域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社会需求角度看,财富管理业务能够提升社会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使资金流向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行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从投资者角度看,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逐年提升的背景下,财富管理业务符合投资者的需求,专业的财富管理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多收益,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换。对于证券行业而言,大资管时代财富管理业务正逐渐提速,通过智能投顾等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深入分析客户特点,提供专业化的财富管理。”

在行业全面开放背景下,外资券商也纷纷布局中国市场,国际竞争有望进一步提升国内券商的创新发展水平。当前行业政策环境相对



宽松,未来几年券商财富管理业务有望加速转型,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财富管理转型需多方面改革

当前,在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转型过程中,受佣金率下降、行业同质化竞争、其他主营业务乏力以及业务转型、金融科技赋能等因素影响,券商的产品、投顾、平台等综合实力需进一步提升,对券商综合服务能力及业务转型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于券商而言,面对当前的财富管理转型趋势,或许需要从产品、员工、科技等方面进行改进。”一家头部上市券商非银金融分析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产品方面,大财富管理时代背景下,券商要迎合各种各样风险偏好和流动性需求的投资者,光靠自己的产品是远远不够的。券商更需将自己的代销产品扩充,去发现银行、信托等其他机构符合自己客户需要的优秀产品,然后进行针对性地推荐,使得客户的需求能够得到更加准确的匹配。

上述分析师还表示,在员工方面,财富管理投资顾问与证券经纪人的定位大不相同。财富管理投资顾问需要对客户的资产配置预

期有所了解,同时对资本市场以及金融产品行情有更加深刻的认知,进而结合市场行情提供资产配置服务。因此,券商开展财富管理业务,更需要类似于银行私人财富经理一样的投资顾问。在当前时点,证券经纪人人数的收缩,以及财富管理投资顾问人数的增加,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

在金融科技赋能方面,上述分析师认为,一方面,券商可以运用金融科技去识别自身客户的风险偏好以及“大画像”,从而针对高净值人群、富裕人群乃至于普通人群,进行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运用金融科技对自己的投资顾问人员提供帮助。

“当前客户基础较为雄厚的头部券商的财富管理业务已经初具规模,财富管理规模、高净值客户数目等都有明显提升。在财富管理业务转型过程中,首先在客户规模方面,券商应提升自身渠道营销能力,结合自身特点,提升活跃用户规模,进而提升资产管理规模。在资产配置方面,应发挥券商在权益市场的投研能力和金融科技能力,挖掘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差异化、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服务。未来随着头部券商的财富管理业务快速转型发展,中小型券商则应建立自身比较优势,在细分赛道发展特色业务。”陈梦浩进一步向记者表示。

中小银行重组频频 省级法人银行组建渐次落地

■本报记者 吕东

随着辽沈银行筹建获批,不到一年时间,已有3家省级城商行筹建,中小银行合并重组进入高潮。

银行业资深观察人士苏芮苒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去年以来,监管层不断推动中小银行“优胜劣汰”与改革重组,将省内较弱的城商行合并,一方面能够提升银行业机构的资本实力与风险抵御能力,化解地区流动性风险;另一方面则能整合有效资源,提升其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促进地区金融结构性平衡。她预计,后续中小银行的合并重组仍将会有新动作。

银保监会官网日前披露的信息显示,同意在辽宁省沈阳市筹建辽沈银行,银行类别为城市商业银行,发起人股东资格由辽宁银保监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审批。

根据此前中国债券信息网披露的《2021年辽宁省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一期)》文件,辽宁省将通过发行中小银行专项债的方式,募资100亿元,通过辽宁金控集团注入新设的城商行作为资本金,而新的城商行将吸收合并2家银行,资产总额为2599亿元。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辽宁省拥有15家城商行,这一数量领先国内大多数省份。而该省城商行大致分为两个梯队。在港上市的盛京银行、锦州银行以及实力不俗的大连银行构成了辽宁省内城商行第一梯队;鞍山银行、本溪银行、朝阳银行、丹东银行、抚顺银行、阜新银行、葫芦岛银行、辽阳银行、盘锦银行、铁岭银行、营口沿海银行、营口银行构成第二梯队,这些银行与第一梯队的3家银行相比,无论是盈利能力还是资产规模上都有较大差距。

去年以来,中小银行合并重组的消息不断,多家银行传出合并重组的消息。

去年9月份,四川银行获批筹建,作为四川首家省级法人城市商业银行,该行注册资本将高达300亿元。

今年3月份,山西银行筹建同样获银保监会批复。该行将由大同银行、长治银行、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阳泉市城市银行合并重组设立。随着5家银行整体重组筹建山西银行,该省的城商行数量将由6家变为2家,形成“晋商银行+山西银行”两强并立的局面。

截至目前,四川银行、山西银行均已开业。加上刚刚获批筹建的辽沈银行,这三家省级城商行的组建,均由省内规模小、盈利少的银行组成,而同省实力较强的城商行则会保留,这已成为当下重组省级城商行的一大特征。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中小银行之所以合并,与其自身面临的困境不无关系。包括最新获批筹建的辽沈银行在内的地方中小银行合并案例,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在于增强银行资本实力,防范金融风险。这些同省实力较弱的城商行合并设立新的省级法人银行后,将有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增强其经营能力。

苏芮苒表示,自去年起,中小银行合并重组进程不断提速,这其中既有历史和现实两大原因。历史原因方面,过去围绕大型银行的风险化解与不良处置做了很多工作,但中小银行还存有不少短板,现实原因则是,通过合并重组,引进合格战略投资者来提升中小银行实力成为银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金融机构数字化三年变革系列报道②

金融数字化解放数据生产力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专访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

■本报记者 李冰 见习记者 张博

目标就是实现端到端路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并逐步替代人工处理和批处理。

那么该如何数字化?对于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正面临哪些问题?怎样有效抓住数字化带来的产业机遇?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者的区别是什么?为此,《证券日报》记者专访了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

《证券日报》记者:各行各业都在探讨产业数字化转型问题,目前我国产业数字化正处于哪个阶段?面临哪些关键问题待解?在数字化浪潮中,中小企业如何搭上数字化转型快车?

沈建光:产业数字化主要是把传统的,所有线下的业务线上化、智能化、数字化。现在很多工厂已经进行数字化改造,根据客户实时需求生产,不仅能快速生产出大批量的货物,也能生产出小批量的,更精准的,可以定制化的需求。这是整个生产工艺流程出现的巨大改变。目前,中国产业数字化仍处于初级阶段,面临诸多挑战:一是连网率低,比如工业互联网渗透率仍然较低;二是技术瓶颈,比如物联网技术还未真正落地普及;三是资金压力,比如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包括人力、产品、生产线等均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四是数据管理风险,产业数字化是以数据为基础,企业需对数据做好隐私保护和风险隔离,同时传统企业面临着购买数据的压力。

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既要“循序渐进”也要“因地制宜”,一方面立足自身行业特征、企业情况,制定短中长期数字化转型规划和目标,另一方面应做好自身优劣势分析,制定好转型方向,布局和专注特色转型产品,扬长避短,才能保持长久竞争力。对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早在2020年5月份,国家发改委已制定和启动“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计划,支持中

小微企业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缩短转型周期、提高转型成功率。

在此基础上,我有三方面建议:一是发挥财政金融作用,针对创新技术提供财税补贴或者优惠,提供针对性地专项优惠贷款;二是地方政府应有意识地鼓励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设立科技产业政府担保基金、债券、信托等;三是建议寻求与大科技公司的合作,包括共同研发、外包、购买大的技术公司产品等。

《证券日报》记者: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金融数字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您认为该如何发挥传统金融机构和数字科技企业的协同关系?能否展开谈谈金融机构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难点、痛点?您有何建议?

沈建光:金融数字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服务小微企业的重要途径。宏观层面,金融数字化有利于构建广覆盖、多层次、有差异的金融体系,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微观层面,数字化是解放金融数据生产力的重要方式,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效率。

金融数字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行业层面需要推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合作,在机构内部需要强化机构内部顶层设计与流程改造之间的上下联动,在业务发展上还需要强化基础设施的底层支持。

一是发挥传统金融机构和数字科技企业的协同关系。未来金融科技和数字化发展的主流路径应该是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双轮驱动”和合作融合。

二是处理好金融机构顶层设计与顶层推动的协同关系。金融数字化既是模式,也是战略;金融机构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离不开战略上的顶层设计和实施上的顶层推动,需要在战略、业务、数据、技术、组织、人才、考核等7方面同向发力,同步迈进。在战略上,金融数字化首先确立数字化战略定位和战略方向,进

而塑造数字化的文化和培养数字化的思维。

三是发挥金融数字化发展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关系。建立和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有助于更好地推动金融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证券日报》记者:数据对产业数字化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其在产业数字化浪潮中作用是什么?对于机构而言,该如何有效掌握和运用数据带来的价值?

沈建光:产业数字化意味着产业数据的在线化、标准化、结构化,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和运营流程的改造。数据对产业数字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据是实现数字化的基础,数据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共同推动产业互联互通,进而实现产业数字化;同时,数据资产化的广泛应用和消费需求的变化将催生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的数字经济。

二是数据的共享、流转和交易等数据资源的潜在价值运用,有利于发挥数据与土地、能源同等重要的要素作用,有利于推动数据流引领物流、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有利于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数据要素的融合协同,有助于打通技术场景和业务场景,进而进行C2M定制,利用全息画像、智能推荐等算法模型,加快区块链、人工智能、边缘计算、量子技术等创新技术研发与实际场景和产业实践的融合,进而发挥技术在供应链、贸易链和产业链的基础推进作用。

《证券日报》记者: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这两个概念常常被一起提及,两者之间有何联系和差异?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区块链、5G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新兴技术的运用其最终目的是否仍然是服务实体经济?

沈建光: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AI)、区块链等新

一代数字科技已经开始深度融合实体经济,推动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主体的数字经济异军突起,为中国注入强劲动力。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大战略下,数字经济好比一把金钥匙,正以其蓬勃之势成为启动中国经济巨轮转型发展的新引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基础部分,它以信息数据为加工对象,以数字技术为加工手段,既实现数据与技术的产业化发展,也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等。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融合部分,以提高生产效率为主线,对产业链的全要素进行数字化再造,从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之间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产业数字化的基础首先是实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是数字产业化的基础,没有数字的产业化,很难有大批的先进技术应用于企业和产业数字化改造。数字产业化如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区块链、5G的应用,不仅成为科技的突破,而且还可以把成果转化成为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当中或者基础设施当中广泛使用的技术,成为产业发展的支柱;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将驱动数字化革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将加速融合,传统产业数字化、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扩大开放合作等方向全面推进,形成整体优势,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数字产业化强调数据的变现,通过技术产品服务推动数字化改造。产业数字化强调技术和产业融合,通过技术提升产业效率,进而提升企业利润;就规模而言,与数字产业化相比,产业数字化涉及产业领域更多、市场规模更大,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

4月份绿色债券发行超500亿元 同比增长24%

■本报记者 张志伟 见习记者 余俊毅

随着我国绿色金融的不断发展推进,我国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也在迅速增长。

政信投资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绿色债券是我国的绿色金融主要融资渠道之一,也是最重要的金融工具之一。从发行规模、涉及产业领域以及社会效益等方面看,绿色金融已经成为我国金融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撑。”

根据东方财富最新统计数据,今年4月份,我国境内市场共有45只“贴标”绿色债券发行,发行规模达514.00亿元,发行规模同比增长24.06%,数量同比提升40.63%;发行规模和数量环比分别降低66.37%和110.00%。从发行债券券种来看,4月份发行的绿色债券包括12只绿色企业债,15只绿色中期票据,6只绿色企业债,1只绿色金融债,6只绿色超短期融资券和15只绿色资产支持证券。12只绿色企业债合计达97.80亿元。

4月份,整体绿色债券现券交易额达890.50亿元,同比增长39.20%,环比提升22.62%,发生交易的绿色债券共180只,同比增长0.56%,环比下降8.16%。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证监会联合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以下简称《目录》)指出,“绿色债券是指募集资金专门用于支持符合规定条件的绿色产业、绿色项目或绿色经济活动,依照法定程序发行并约定还本付息义务的有价证券”包括但不限于绿色金融债券、绿色企业债券、绿色公司债券、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和绿色资产支持证券”。这进一步规范了我国绿色债券市场。

东方财富绿色金融部负责人方伯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加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纵深推进,绿色发展内涵不断丰富,产业政策持续更新,技术标准不断升级,现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范围的界定和技术标准也需要适时地更新升级来适应新时期绿色低碳发展的需要。

方伯向认为,《目录》统一了各类绿色债券定义和分类标准,并覆盖到了所有的绿色债券类别,《目录》明确了技术筛选及国家行业标准等详细说明,这不仅有助于降低绿色标准识别成本,也有利于提升绿色债券业务管理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同时《目录》删除了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这有助于推动我国与国际主流标准的接轨,帮助国内发行主体赢得更多国际投资者的认同。此外,《目录》与2015版目录相比有了较多扩充,新增了绿色服务、绿色装备制造类项目,产业园区绿色升级类项目等内容,这有助于充分发挥绿色债券在推动经济可持续低碳发展,引导绿色低碳生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推动绿色债券市场进一步扩容。